

精神分析与乌托邦的碰撞：论白日梦中的乌托邦精神

王迪一

（福建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福建省福州市，350000；1969514139@qq.com）

摘 要：恩斯特·布洛赫试图通过将乌托邦精神注入精神分析学来塑造一种全新的白日梦理论，他一方面吸纳了精神分析学的科学论断，另一方面对精神分析的动力源、质料源与解析路径进行了乌托邦化的重塑。布洛赫塑造这种乌托邦化白日梦的理论旨归是唤醒其内核的乌托邦精神，布洛赫透过战争的灾难发现了现代人的根本困境：人的精神正在不断枯萎，个体超越维度的丧失导致现代人逐步沦为“社会的动物”。这种洞见时至今日仍极具反思价值，在布洛赫乌托邦哲学的理论视域下，脱离这种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唤醒潜藏于人乌托邦精神：首先通过内在的道路达到“自我相遇”，其次通过外在道路实现其现实转化，使我成为“真我”，世界成为“家园”。

关键词：精神分析；白日梦；乌托邦精神

引言

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理论为认识并解析我们的梦提供了基本范式，但该理论自创生之日起便饱受争议，在布洛赫之前，已有众多学者尝试对其基础理论进行批判和改造¹。但这些“改造”无非标明截然不同的冲动力量，要么给“力比多”重新镀金[1]（p.44），其本质仍是在弗洛伊德主义内部“兜圈子”，精神分析学的固有弊病非但没有得到解决，反而在“欲望说”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布洛赫敏锐地发现，精神分析学家对梦的理解往往停留于“回忆”，而忽视了梦的“预见”功能，这正是精神分析学止步不前的原因，因而布洛赫创造性的将乌托邦精神注入了精神分析学，构筑了一种乌托邦化的白日梦理论。

布洛赫对精神分析学的白日梦理论进行乌托邦化重塑的工作服务于其乌托邦哲学的建构，在他看来，白日梦是“预先推定的意识”，它的意义在于指引人们发现未来视域中的“尚未”之物。布氏白日梦以乌托邦精神为内核，并以乌托邦精神的唤醒为理论旨归。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精神是人之为人的根本，只有唤醒乌托邦精神才能使人脱离异化状态，回归本真自我。唤醒乌托邦精神的工作源自布洛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笼罩欧洲社会的阴霾的洞见，他发现，人的精神由于超越维度的缺失正在逐渐枯萎并走向死亡，而脱离困境的唯一出路就是唤醒潜藏于人的乌托邦精神。这种洞见时至今日仍极具反思价值，近年来，享乐主义与虚无主义在社会中渐成流俗，在此背景下，唤醒潜藏于人的乌托邦精神，重塑人的超越维度与进取精神就显得尤为重要了。

¹ 弗洛伊德的学生阿德勒（Alfred Adler）将权利意志视作人的基本冲动，在他看来，人首先想要支配和压倒他人，人的本质是统治和征服。阿德勒驱逐了力比多中“性”的部分，并用“个体权利”取而代之，进而走向了从叔本华到尼采的那条资本主义道路。参见其代表作《机体自卑感研究》（1907）、《理解人类本性》（1918）、《个体心理学的实践与理论》（1920）、《自卑与超越》（1932）等等。弗洛伊德的另一学生荣格（Carl Gustav Jung）把陶醉冲动（Rauschtrieb）视作人的基本冲动。他致力于将力比多及无意识内容还原为史前时代的东西，因此，人的意识的精神渊源在于遥远的太古时代。他的精神分析就是后退到史前的黑夜中。参见其代表作《无意识心理学研究》（1912）、《心理类型》（1921）等等。

1 乌托邦式的白日梦：弗氏精神分析的解构与重塑

提到“做梦”这一现象，人们似乎会自觉地将之归纳为夜间所发生的行为活动，因而“梦”也就自然而然地被划归到了夜梦体系之下。但在夜梦之外，还存有一种人在清醒状态下对美好未来构想的白日梦²，但他却刻意淡化了白日梦的特殊性，如他所说：“夜梦无非是因为不受任何控制或限制而获得自由的白日梦，它借助于夜间的心灵活动披上伪装[2]（p.417）。”这套说辞在布洛赫看来是荒谬的，他反驳道：“夜梦大都是由过去的冲动供给的，即由过去的材料组成的，而且在赤裸裸的月亮之下，夜梦并不发生任何新东西，”而白日梦却是“率先行动、未雨绸缪和预先推定”[1]（p.83）。布洛赫敏锐地捕捉到了白日梦与夜梦间质的差别，因而他试图在精神分析学的夜梦桎梏下打开一个缺口，将作为“清醒之梦”的白日梦解放出来，构建一个新的理论体系。

然而，布洛赫白日梦理论建构的工作性质并非“开创性”而是“改造性”，它的实质是在旧有夯土之上建新房。布洛赫一方面以精神分析学关于梦本质与人格说的科学论断为地基，另一方面对弗氏梦理论进行了解构，从动力源、质料源、解析路径三重向度重塑了白日梦理论大厦的梁柱。

布洛赫对弗氏梦理论采取了一种扬弃态度，他首先继承了弗洛伊德理论的精髓。在梦的实质方面，弗洛伊德提出了一个公式：梦是被压制、被排斥的愿望的伪装式实现[3]（p.146）。他断言道：“梦只能理解为愿望的达成，它们还会毫不掩饰地将这种内涵展示出来 [3]（p.114）。”布洛赫对此同样深信不疑，在他看来，“梦不仅在形式上像罂粟世界一样保护睡眠，而且在内容上像发动机一样满足各种愿望。这一点自从弗洛伊德以来已被澄清，自他以后也将保持不变[1]（p.71）。”梦是介于泡沫与先知预言之间的东西，它既非空想，也非天启，而是基于自身的，对未来的美好构想，换言之，它代表本己愿望维度的实现。

然而，愿望的表达并不直观，它呈现到梦中的图像总是扭曲的，弗洛伊德用人格说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回答。在他看来，人格可划分为“本我—自我—超我”。“本我”（Es）是代表性欲能量的力比多（Libido）的贮存仓库，在力比多的支配下，本我遵循唯乐原则而忽视现实社会道德规范。“自我”（Ich）作为“本我”的约束力量“将外界世界的影响带来施加在本我及它的趋向之上，并尽力用现实原则来代替本我中起着无限主导地位的宽宥原则的地位”[2]（p.188）。这种人格说给了布洛赫很大启发。尽管他对弗洛伊德的“泛性论”嗤之以鼻，但他却认可了本我所表达的欲望向度。自我对本我的抑制存在阈值限定，它需要以符合伦理规范的形式对欲望冲动加以满足，这种变相满足的结果就是“梦的扭曲”。正如布洛赫所说：“几乎每一种梦都不是纯粹地反映愿望的满足[1]（p.72），”它们都会被歪曲并戴上假面具，“而在某种象征性地歪曲的梦的图像中，永不安宁的力比多得到证实，并得以深深的满足 [1]（p.73）。”

布洛赫对弗洛伊德的改造不同于以往的精神分析学家们，他在弗氏梦理论精髓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了三重向度的重塑。在梦的动力源上，布洛赫以饥饿冲动置换了弗洛伊德的性冲动。布洛赫发现，精神分析学家们试图将人的多样化冲动意向熔铸为一个具有普遍性地位的基本冲动，这种基本冲动为梦提供了本源动力。在弗洛伊德这里，人的基本冲动是“性”。在他看来，性冲动“不仅包含了严格意义上的不受约束的性的本能和源自它自身的目标抑制或者本性升华的本能冲动，还包含了归属于自我的自我保护的本能 [4]（p.205）。”布洛赫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如是说道：“渴望爱情的姑娘和小伙子不能唤起人们的巨大同情感。但是，在所能提供的最直接了当的悲叹中，也许对饥饿的悲叹是唯一最强烈的悲叹 [1]（p.55）。”由于精神分析学家及精神疾病患者大多出身中产阶级，无需担心“胃”的需要，因而他们淡化了经济侧面的需求而将关注点放在了性爱侧面的“俄狄浦斯情结”。但恰恰在下层社会，“饥饿和焦虑限制了力比多 [1]（p.57）。”布洛赫的饥饿冲动驳斥了弗氏饥饿冲动的论断，它并非口欲期的性满足，而是建立在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意向消除匮乏状态，获取生存资料的自我保存的渴望。“饥饿的扩大”熔铸了人的自然生本能与“匮乏”条件下的社会历史需求，它以物质生产条件为基础，囊括了包括性冲动在内的一切冲动，这就彻底扭转了弗氏基本冲动的逻辑理路，也代表了以“物质人”为基础的经济史观对以“生理人”为基础性爱史观的根本超越。

² 弗洛伊德试图用与夜梦相同的理论图式分析白日梦，在他看来，白日梦的本质是“幻想幸福”，即完全独立于现实，幻想重新制造快乐的满足。因此，白日梦与夜梦一样，代表了永不饱足的欲望，它仅仅是夜梦的前阶段，白日梦的作者也不过是只“睁着眼睛睡觉的兔子”。同时他将白日梦与文艺创作结合起来，认为白日梦是艺术的前兆，文艺创作其实是创作家与欣赏者在美学的伪装掩盖下释放被压抑的性本能的过程。参见弗洛伊德《创作家与白日梦》，上海教育出版社 2003 年版。

在梦的质料源方面，布洛赫用“尚未意识”置换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弗洛伊德将“无意识”视作梦的质料源，它代表自我压抑后的性本能欲望。无意识领域如同环绕在意识领域的一个闭环，而精神分析的任务就是探求无意识内容，如他所说：这是探险地下室和地狱之河的工作。但在布洛赫这里，为白日梦提供素材和养料的是与“无意识”截然相反的“尚未意识”（Not-Yet-Conscious）。作为基本冲动的饥饿一方面要求批判和否定现存的“匮乏”状态，消灭妨害自身扩张的贫困性因素，另一方面驱使人们向着未来的地平线前进，塑造完满性的新事物。因此，饥饿的意向对象便指向了发生学意义上的“尚未”。“尚未”意为“还不是”或“还未形成”，它是超越现存困境、面向未来的理想维度，它蕴含发自生命本身、面向开放与可能的热情、活力与冲动[7]（p.72）。布洛赫试图用认识论层面的“尚未意识”置换“无意识”，来实现白日梦质料源的根本转向，并赋予其前所未有的观察未来的开放视野。在他看来：“白日梦提供奇思妙想，但这种突发念头不是解释，而是领会，它构筑空中楼阁和计划图像，但并非总是归结于虚构的东西[1]（p.82）。”白日梦是“预先推定的意识”，它的内容图像遵循自我想象的轨道，在“尚未意识”的引导下，白日梦褪去了“无意识”的非理性色彩，它不再沉沦于膨胀的欲望，开始认真思考未来视域下的可能问题。

在梦的解析路径上，布洛赫用积极地前进指向置换了弗洛伊德消极地后退追溯。精神分析学将梦的解析工作规定为透视人真实感受到的“显梦”去发掘象征性表象深处被压抑的“隐梦”。在弗洛伊德这里，“隐梦”存在于无意识领域中，它更接近于一份氏族遗产，表现在个体层面是对童年记忆的追溯，表现在整体人类层面是对原始人类遗产的回归。弗氏梦的解析路径就是向着过去遗产的“考古”。布洛赫将这种路径定义为“退行”（Regressionen），在他看来，尽管这种“退行”的释梦路径能够更加深入发掘人的内在心理特质，但仅停留于对过去发生影像的考察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未来视野的缺失；同时，这种“退行”也将人性变得模糊不清，仿佛人只是停留于过去的残留影像，如他所说：“人们把某种退行一基础（Regressio-Grund）当作医学和道德来赞扬，而对于这种退行一基础来说，一切人性都重新变得陌生了[1]（p.53）。”在布洛赫这里，“隐梦”的内涵只能在“尚未意识”中寻找。梦的质料源转化必然扭转了梦的解析路径，弗氏的“退行”在此也转向为了“前行”。白日梦的真正意义在于引导人们发现未来的“尚未”之物，世界与人都作为可能的意蕴来展开，外部世界的永恒发展性要求我们必须以动态的眼光去思索和探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人在实践与理论中依靠人的本质力量建立起的与未来世界的对象性关系揭示了人类历史的未来维度，因而只有前进的解析路径才能够真正理解白日梦中幻想的地平线，进而发掘其未来价值与希望本质。

至此，布洛赫对弗洛伊德梦理论的解构与重塑工作基本结束，布氏白日梦理论大厦建构完成：它在继承精神分析学科学论断的基础上，用饥饿冲动置换了性冲动，重构了梦的动力源；用“尚未意识”置换了“无意识”，重构了梦的质料源；用前进指向置换了后退追溯，重构了梦的解析路径，它有着区别于弗氏夜梦并成为其自身的根本特征。

首先，白日梦本身具有一种自由性与革命性。“清醒之梦本身渴望自由自在，它不想被压得喘不过气来[1]（p.84）。”作为白日梦质料源的“尚未意识”并不拘泥于过去的碎片记忆，而是指向蕴含无限可能的，开放的未来。在白日梦中，自我始终保持着清醒的状态，尽管在白日梦中也存在着诸多歪曲的与虚幻的图像，但这些图像始终遵循着自我所设定的轨道而前行，它们依赖于自我，而非全然独立的、超出自我界定的存在。正如布洛赫所说：“清醒之梦的空间是借助于纯粹的自我选择的想象安排的[1]（p.84）。”这就与夜梦中那种全然不知从何而来的虚幻的图景有着天壤之别。

其次，白日梦与现实生活保持着密切联系。与夜梦中像“稀粥一样，极易分崩离析，四分五裂”[1]（p.84）的自我不同，白日梦中的自我并没有受到过多的削弱。这里需要重提一下弗洛伊德的人格说，在夜梦中，意识的空窗使得苏醒的自我变得十分虚弱，“外部世界及其现实乃至实际生活的目标内容受到严重阻滞”[1]（72页）。自我如同醉汉一般进行它的审查。由于与现实生活严重脱节，夜梦只能将人的意识封闭在无意识这一狭小的空间之中。但在白日梦中，自我意识依旧强健，它“具有紧张的肌肉和具体的头脑”[1]（p.88），借助白日梦的外壳恣意释放想象力，在这种条件下，自我意识与清醒的梦想之间保持着密切联系，从而“停留在自身生命与清醒世界的关联之中”[1]（p.84）。

最后，白日梦的本质是希望。布洛赫认为，希望相对其他情绪享有崇高地位，它吸收了想象与预先推定的能力，代表着光明与生命，给予人战胜畏惧的力量。同时，希望包含了一种清醒的客观实在性，它并不意向某一既定目标，但它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意图的渴望，指向未来意义的“尚未”之物，正是希望构成了

白日梦区别于夜梦的真正本质。在白日梦中，“非及物”的希望通过“及物”的愿望想象表露出来，它“感化和强化了白日梦中的自我本身”[1]（p.87），自我不再执行道德审查功能，而是逐渐乌托邦化，并着手搭建自己幻想的空中楼阁。在这里，清醒的自我摒弃了虚假的陶醉，在与现实世界的联系之上，思考一些更为严肃的，具有超越意义的内容。膨胀的私人欲望至此逐渐淡去，取而代之的是冉冉升起的“人的心灵中有约束力的、与日俱增的共同愿望：即描绘一个更美好的世界”[1]（p.88）。

综上，白日梦源自“匮乏”，由饥饿驱动，蕴藏着对更美好生活的幻想，即“希望的原理”。布洛赫重塑白日梦理论的初衷是为其乌托邦哲学寻求理论支撑，因而他将乌托邦精神注入弗氏精神分析学，来试图构建一种乌托邦式的白日梦。因此，要领会布洛赫白日梦理论的核心要义，就必须更进一步，发掘其乌托邦精神的理论内核。

2 白日梦的乌托邦精神内核

乌托邦（Utopia）一词最早出现于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在书中，莫尔描绘了一个没有剥削、秩序井然、人人平等幸福的理想社会。乌托邦一词便成为理想社会的代名词。此后，大量乌托邦思想如雨后春笋般兴起，但反对者也接踵而至³。布洛赫致力于为乌托邦正名，试图为乌托邦寻找一个本体论与认识论上的依据，构建一种“乌托邦哲学”。这种哲学围绕着乌托邦精神的缺失与唤醒进行构建，在他看来，乌托邦精神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只不过“它依然处在阴影中，对自身而言它是个隐匿者 [5]（p.172）。”但乌托邦精神并非不可捉摸，它会在现实世界中显现出来，白日梦即是布洛赫为乌托邦精神塑造的一种居所，如他所说：“白日梦预先获取并提高与人相关的东西。社会乌托邦乃至美好的乌托邦、甚至被神化的愿望也都仅仅在白日梦中才有固定的住处 [1]（p.94）。”乌托邦精神以自身的超越性、现实的批判性、目标终极性与开放性间的张力为特征，这三重向度在布洛赫乌托邦式的白日梦中获得了完整诠释。

在白日梦中，通过幻想更美好的生活，人不断超越自身并趋向完满，这就是布洛赫所说乌托邦精神体现的“人的神性”。《希望的原理》从“小小白日梦”开始，以人的生命为横轴揭示了不同时期的白日梦幻想，这些小小的愿望正是整个市民社会愿望的缩影，乌托邦精神将这些不规则的愿望串联起来，并给予了人们不断超越自身的永恒力量。童年时期，我们幻想外面的世界，希望驱车远行；我们搭建自己的“秘密基地”，“它跳过学校和家，带给我们美好而珍贵的东西 [1]（p.5）。”进入青年阶段，有关爱情的欲望开始逐渐膨胀，我们渴望一场美丽的邂逅，寻求结识新的伙伴。我们斗志昂扬，坦荡地设想遥远的乌托邦。正如布洛赫所说：“青年人梦想那种必须克服的冒险、必须发现的美、必须争取的伟大 [1]（p.10）。”进入中年，我们对未来的愿望不再那么天马行空，而是着眼当下，设想一些离我们更近的生活满足。于是，贫穷的人幻想奢侈的生活；富裕的人幻想无边的享乐。横流的物欲蒙蔽了人们的眼睛，但也有一些“非市民的做梦者”觉醒了。他们幻想未来平等和没有剥削的社会，这些人的理想便指向了一种革命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步入暮年，我们不再富有斗志和驰于想象。取而代之的是对宁静生活的渴望。如布洛赫所说：“愿望与能力，没有卑贱的匆忙，重要的领会，不重要的遗忘：诸如此类的生活乃是老人本真的生活 [1]（p.26）。”

布洛赫做了人一生的“白日梦报告”，他并非为了描绘愿望内容，而是揭示人本质中的驱动性与超越性。人的一生都在持续不断的做梦，尽管在现实生活饱尝苦果，人始终没有放弃希望而沉入绝望，始终向着未来的无限可能性开放自身。正是在乌托邦精神的光耀下，人永远饱含热情与动力，意向更美好的生活，不断超越既定的现实，永不休止，向着完满性的地平线前进。

白日梦在乌托邦精神的感召下，超越了自私自利的欲望而倾向于描绘更美好的世界，此时的白日梦因拥有了“人类的广度”而尝试与其他自我共同批判和改造现实社会，因而白日梦中充斥着扩张的意志与前进的动力，它是“关于完满性的切实可行的、精确的想象力试验”[1]（p.93）。布洛赫指出，“世界改造之梦（Welt-verbesserungstraume）试图从其内部向外突破，换言之，这种梦作为外向的彩虹或天穹冉冉升起在人们的意识中 [1]（p.89）。”马克思主义认为，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

³ 其他乌托邦著作如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培根的《大西洋岛》、圣西门的《一个日内瓦的居民给当代人的信》、傅立叶的《新世纪》等。这类思想被称作“乌托邦主义”，代表了对未来美好世界的希冀。反乌托邦者认为这些是纯粹的无稽之谈，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代表作有扎米亚金的《我们》、赫胥黎的《奇妙的新世界》、奥威尔的《1984》等。

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白日梦在人的意识层面预先构筑了一个完满的乌托邦目标，这一目标作为现实“匮乏”的对立物存在，白日梦在指引人走向终极的理想世界时就必然具备了一种批判现存世界的否定意义，乌托邦精神的批判性在此刻得到彰显。在乌托邦精神的感召下，人逐渐将内在的乌托邦冲动转化为外在力量，鼓舞人们改造不完满世界的实践活动，并逐渐升华引导整个社会的革命斗争。人们在驶向未来地平线的时候也在不断唤醒与内化乌托邦精神，这种由内而外，再由外向内的转化过程形成了一种逐渐摆脱异化枷锁，趋向完满的良性循环。

白日梦永不气馁，它永远向着未来的地平线前进，它的意向目标表现为一种终极性与开放性之间的张力。“白日梦拒绝自欺欺人、虚假的饱和状态，或者仅仅从精神角度去解决愿望 [1] (p.94)。”在弗氏精神分析的视域下，超我的压抑使得本我冲动只能寻求精神侧面的虚假满足，它并不具备现实的可能性基础。而布洛赫的白日梦“不仅是科学的客体，也是科学的主体，[1] (p.99)”它一方面包含着需要科学研究加以论证的客观因素，另一方面以其蕴藏的乌托邦精神鼓舞人的实践行为，激励人向着乌托邦的终极目标迈进。正如布洛赫所说：“白日梦拥有一个目标，而且为了这一目标向前发展[1] (p.99)。”但世界是作为可能的意蕴来展开的，且在世的一切世内存在者其自身的开放也是向着无限的可能性开放。人作为在世存在，其“在其存在之中已经先行于它自身了” [6] (p.221)。世界与人的永恒发展性表明，乌托邦精神作为一个目标并不具备终极性，而是表现为一种介于开放性与终极性之间的张力。白日梦在遥远的未来勾画出一条地平线，在乌托邦精神的指引下，人每一次向着地平线的前进都是实现过去的地平线的过程，同时也是幻想新的地平线的过程。人就是在这种不断地实现与超越中无限接近开放的终点。

综上，白日梦作为向前的黎明，它的形体以乌托邦精神为灵魂，它的存在体现了乌托邦精神的鲜明特质：对内表现为对自身的超越性；对外表现为对现实的批判性与目标的终极性与开放性间的张力。在布洛赫看来，乌托邦精神是人神性的体现，它代表了人超越现状与希冀未来的一种自觉，这种精神力量对人的生存与发展有着重要意义，因而必须唤醒潜藏于我们的乌托邦精神。

3 唤醒我们的乌托邦精神

为什么要唤醒乌托邦精神？布洛赫提出的这个命题有着深刻的历史根源：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洲的物质生活造成了沉重打击，更可怕的是，人们的精神面临着灭顶之灾，“而今天，只剩下文明的疲惫……但对欧洲来说，只有即将到来的、永恒的死亡。[5] (p.2)”布洛赫透过欧洲社会洞察到，现代人已然陷入了一种生存困境，“我们中间的所有人都或者崇拜自己的肚子；或者崇拜国家；所有其他的一切都被下降到了玩笑和娱乐的水平，[5] (p.2)”人由于精神的枯萎逐渐沦为了一种可悲的“社会的动物”。时至今日，这种对人生存困境的洞见仍具启示意义。布洛赫指出，要破除这种困境，唯一出路就在于唤醒潜藏于人的乌托邦精神。

如何唤醒乌托邦精神，是布洛赫乌托邦哲学讨论的核心议题。在他看来，唤醒乌托邦精神只有通过内在与外在相结合的道路才能实现：首先通过内在的“自我相遇”(self-encounter)，预设个体的完满性存在状态，在此乌托邦目标的指引下，通过内外转化，对外部既定存在进行批判与改造，真正实现未来之我与完满之我的统一。

唤醒乌托邦精神首要进行内在道路的挖掘。“认识你自己”，是自苏格拉底提出以来经久不衰的议题，布洛赫在继承了康德对人内在性的发掘道路的基础上，将此议题变式为“自我相遇”，如他所说：“没有我们自己，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将来会是怎样的 [5] (p.173)。”“自我相遇”之路的起点是“瞬间的黑暗”，它代表了现实之我。在布洛赫看来，我们的意识所能够捕捉到的经验对象永远停留于过去而无法真切地理解当下的现实，因此，我们对本已存在的认识在当下的瞬间中仿佛置身黑暗。但这种黑暗并不完全等同于束缚人的囚笼，恰恰相反，它同时也为我们屏蔽了外在世界的虚假诱惑，使得我们内心更加空明澄澈，进而发现照亮黑暗的乌托邦精神之光：希望。

在我们的意识捕捉到了这片乌托邦的曙光时，我们就会产生一种如天光破云般前所未有的主观感受，布洛赫将这种诞生于希望中的感受命名为“惊奇”(amazement)，正是“惊奇”打通了我们内在的乌托邦之路。在布洛赫看来，“惊奇”之所以令人震惊，是因为它所给予我们的感受并非过去的“重复经验”而是一种全

新的“未经验”，且它发生于瞬间，毫无规律可循，正是这种突然的冲击得以让人们心中重燃乌托邦的圣火。他进一步指出，这种“惊奇”与“瞬间的黑暗”是相应的：“它们起初是否定性的，因为两者都永远不能被看到，因此最终保持非客观性，而后是积极的，因为两者不仅在形式上代表了世界中的新事物，而且在实质上表达了我们相同的意图 [5] (p.202)。”但不同于“瞬间的黑暗”，“惊奇”的黑暗性是潜在的，也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人们才得以透视存在的阴霾而发现个体生活与现实社会的“匮乏”。这就表明，我们无法在当下把握本已存在，而“只有在希望中，我们才能够关注自身的存在，走向自我面对 [8] (p.173)。”

“惊奇”在打开乌托邦之路大门的同时，也指向了“自我相遇”道路的终点：与完满之我的相遇。在布洛赫看来，惊奇与希望的对象不是外部世界的“既定存在”而是内心世界的“尚未存在”，它严格遵循着自我内在之路的轨迹，代表了个体对自身完满性的筹划。同时，内在的“自我相遇”之路并非空中楼阁，它在现实世界依然有迹可循，布洛赫指出，现实社会的道德与良知的观念都源自对未来的希望，代表了对匮乏现实的超越，因而这些观念实质上仍是乌托邦精神的外显，这也进一步表明，人存在的本质性规定就是乌托邦精神，因为具体的人在外部世界的实践活动正是在乌托邦精神引导之下完成的。乌托邦精神体现了个体超越性与内在性的统一。所谓超越性，即乌托邦精神能够指引人从“瞬间的黑暗”中解脱出来，不断完善自我，驶向乌托邦的彼岸；所谓内在性，指乌托邦精神是以内在之我为基石，它作为意向目标并不指向他者，而是指向个体完满性的“真我”，它的终极性表现为使我成为“我”，世界成为我们的世界，如布洛赫所说：“我们自己就是引导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变革的原则 [5] (p.228)。”

“自我相遇”的最终目标是实现未来之我与完满之我的统一。通过内在道路，我们获得了亟需实现的目标性指向，正如布洛赫所说：“如果没有内在的世界，我们投向外在世界的目光都将是空洞无神的，都将是毫无吸引力的 [5] (p.3)。”但仅在内在世界中规定个体完满性的存在而不思考其外在的现实实现问题，就会重又堕入空想乌托邦主义的深渊中，因而他继续强调道：“在这个内在的纵向的历程之后：愿一种新的扩张能出现，愿世界成为灵魂的世界，愿乌托邦的外在宇宙功能得以实现 [5] (p.3)。”在哲学观上，尽管布洛赫宣称他的乌托邦理论继承的是康德对人内在性追问的道路，但他同样指出，康德的道路是不彻底的，外部维度的缺失使得康德的乌托邦精神走入了死胡同，因而布洛赫要实现对康德的超越，就必须在内在性分析的基础上进行外在转化，换言之，康德只有通过黑格尔才能实现完满⁴。

将人的内在诉求转化为外在实现是源自人类生命的自觉。布洛赫认为，“只有人能够照亮自己的类，照亮自己所处的地方 [5] (p.234)。”马克思主义指出，人区别于动物的真正本质在于人拥有意识。相较于自然界的动植物，人类意识具有透过他者的“类属性”来审视自身“我属性”的能力，因而只有人能够发现并追问自我内心的真实诉求，人的生存本能在个体内心深处自觉性的引导下迫切地希望突破现存“匮乏”状态的限定，摆脱异化状态，将外部世界改造为“惊奇”所发现的家园。

同时，我们的外部世界充满着虚假的诱惑，且个体生命的死亡也“悬临”于前，如果没有外在道路的突破，我们的内心世界也终将枯萎并走向死亡。首先，外部世界的虚假诱惑会不断腐化我们的心灵，在布洛赫看来，“外部世界并不能提供给我们安全的信息……我们必须学习进入周边的世界，深入感知其经济、社会、生活模式，不能仅停留于内在的自我之中 [5] (p.234)。”这就表明，我们需要在自觉追问乌托邦精神的基础上将其付诸于具体的实践，不断改造和超越现存社会，此时的乌托邦精神也就获得了一种近乎于革命的良知，并兼具着将人类带向乌托邦的历史使命。

实现内外道路的转化必须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在布洛赫看来，死亡是“生命完全被熄灭的行为”[9] (p.340)，人出于本能的“畏”会尽力逃避死亡，但死亡的意义并不局限于个体，它同时也是更大存在建立的一个阶段[10] (p.50)。尽管个体生命是有限且脆弱的，但个体背后的人类种族是强有力的，正因为有了死亡，人类才能繁衍生息，因而死亡就构成了种族接续性的纽带。作为个体的自我只有自觉承担乌托邦精神赋予的历史使命，

⁴ 布洛赫认为，康德哲学高于黑格尔哲学，康德哲学通过坚持人的内在性而凸显了我们对应当的感受性 (sensitivity)，而黑格尔哲学则通过内在与外在的转化，使我们彻底地丧失了这种感受性，使得人与虚假的外在世界之间的张力消失了。布洛赫继承的是康德的道路，但他同样指出，康德哲学的内在道路并没有被坚持彻底，康德的乌托邦精神被最终局限在方法和恶的无限性之中，因而康德的道路只有通过黑格尔才能实现完满，即必须通过内外转化，发挥乌托邦精神的外在功能。参见张双利《乌托邦与我们——论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现实意义》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01 年第 4 期，第 171-174 页。

超越对死亡的恐惧，在同外在世界的虚假与匮乏战斗中才能实现对个体有限性的超越。布洛赫同时指出，死亡并非一种褫夺，它的结果是“灵魂转世”，这种“灵魂转世说”为个体存在转入类存在提供了可能。在他看来，掌握灵魂转世的权柄不在神明，而在我们自己的手中，是我们“利用”死亡的威迫使自我的灵魂逐渐绽露，它不仅代表了对“生前事”的回忆，更代表了对“身后事”的希望，在希望之光的照耀下，我们真正地理解并超越了自我，成为本真的人，外部世界也成为了我们的世界。

至此，布洛赫通过内外道路的结合，实现了对乌托邦精神的唤醒。但他同时强调，乌托邦精神的唤醒工作绝非朝夕之功，也非一劳永逸，而是一个漫长且历尽艰辛的过程。但这同样是我们通达彼岸世界的必由之路，我们只有在这个过程中不断追问，不断探寻我们的问题，才能使我成为“真我”，直至实现完满。

4 以辩证的眼光审视乌托邦精神

综上，布洛赫以弗洛伊德的理论精髓为地基；以饥饿冲动、尚未意识与前进指向为梁柱；构建了一个崭新的白日梦理论大厦。作为布洛赫白日梦内核的乌托邦精神，它以对自身的超越性、现实的批判性、目标终极性与开放性间的张力为特征，代表了人的否定精神与超越力量。要唤醒潜藏于人的乌托邦精神，需要将内在道路与外在道路相结合，通过内在道路达到与完满之我的相遇，并通过外在道路，实现其现实转化，使我成为“真我”，世界成为“家园”。布洛赫开创的乌托邦精神理论深刻影响了布洛赫之后的众多思想家，马尔库塞对此也直言不讳：“《乌托邦的精神》，这本四十多年前出版的书，至少影响了我们这一代人。”

但这种宏大的影响力并不意味着乌托邦精神理论就等同于真理，我们在鉴纳布洛赫留下的这个伟大遗产时应当以一个理性的视角辩证看待。乌托邦精神从本质上来说仍是意识层面的东西，尽管这种内在的东西可以通过人的实践转换为外界力量，但二者之间有着质的界限。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片面强调思维的超越向度，甚至将人内在的乌托邦式的希望视作历史发展的源动力，人作为乌托邦精神的承担者取代了外部世界的客观性，具备了相对于历史规律的优先权，这就使得他的乌托邦想象跌入了抽象性的深渊。再者，浓厚的宗教神秘主义气息也使布洛赫的乌托邦哲学饱受诟病。他将对乌托邦的追求视作弥赛亚的现实实现，这种依靠乌托邦精神的外化来推动社会历史进程的观点更像是启示录般的预言，它描绘未来图像，却提不出实现它的方案，因而这种乌托邦哲学更接近一种形而上学的乐观主义哲学。但无论如何，布洛赫的乌托邦精神理论仍是当代社会的重要理论资源。它对人超越维度的强调，对未来的美好希冀，对挫折永不屈服的态度仍是鼓舞我们砥砺前行思想宝库。

参考文献

- [1] 布洛赫. 希望的原理（第1卷）[M]. 梦海, 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12.
- [2] 弗洛伊德. 精神分析引论 [M]. 殷世铤,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1935.
- [3]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 [M]. 殷世铤, 译.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4.
- [4] 弗洛伊德. 自我与本我 [M]. 涂家瑜, 译. 北京: 台海出版社, 2016.
- [5] BLOCH E. The Spirit of Utopia [M]. Translated by Nasser A A. U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 [6] 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 [M]. 陈嘉映, 王庆节,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4.
- [7] 许秩嘉. 精神分析与马克思主义的交汇前奏: 布洛赫对弗氏“白日梦”的乌托邦化解析重构 [J]. 理论界, 2021 (7).
- [8] 张双利. 乌托邦与我们——论恩斯特·布洛赫的乌托邦思想的现实意义 [J]. 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评论, 2001 (4).
- [9] 布洛赫. 基督教的无神论 [M]. 梦海,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7.
- [10] THOMPSON P. Ernst Bloch, Ungleichzeitigkeit, and the Philosophy of Being and Time [J]. New German Critique, 2015 (42).